·历史研究·
DOI:10. 20004/j. cnki. ujn. 2026. 03. 008

朝鲜半岛思想界的转向及其动因
——以《开辟》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郑立菲

[摘　要]《开辟》作为20世纪20年代朝鲜半岛思想界颇具代表性的综合杂志,自1923年论调发生重大转向,从提倡个人、民族精神层面的"改造",转变为推崇社会主义革命。该转向既标志着《开辟》对反帝反殖民道路的选择,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朝鲜半岛悄然落地生根。考察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可发现兼具偶然与必然因素。偶然层面,朝鲜资产阶级在物产奖励运动中暴露的利己性与软弱性,加速了民心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社会主义理论家转战《开辟》直接推动了转向的完成。必然层面,《开辟》的人本主义底色,令其从人类生活的逻辑出发探索朝鲜的独立之路,也因此无法逃脱现实的检验。其结果是,当时遭受日本、朝鲜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朝鲜无产大众,亟待能够改变日常生活的行动方略,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一的"阶级",恰好弥补了"个人"与"民族"在社会组织机能上的匮乏,必然被知识分子所瞩目与运用。

[关键词]朝鲜半岛;改造;社会主义;《开辟》;反帝反殖民运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逐渐觉醒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众掀起第一次反帝反殖民运动的浪潮。自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也在该时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无论是1919年的三一运动,还是此后兴起的结社、创刊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向往独立的意志,探索实现解放的道路。其间,由开辟社创办于1920年的《开辟》杂志,尽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层层审查,仍坚持刊登各种充满思想性的政论文,并凭借先进的销售模式,在引领舆论风向的同时,反映社会思潮的动向,成为考察20世纪20年代朝鲜半岛思想界的范本①。不但如此,《开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与接受,更开启了朝鲜半岛传播社会主义的先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对该时期朝鲜半岛的思想界,尤其是社会主义初期传播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②。而韩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韩国独立运动时期'联中抗日'思潮研究"(项目编号:21CSS022)。

[作者简介]郑立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箱:zhenglf@cass. org. cn。

①《开辟》由天道教人士于1920年6月在京城创刊,内容涵盖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三一运动后传播新文化、启迪民智的重要综合性月刊,于1926年8月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制停刊。本文选择《开辟》而非报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其时效性虽弱,但对热点事件探讨却更为全面深入,兼具引领思想动向的舆论功能。

②我国学界多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历程,代表性论文有且不限于:方浩范:《浅谈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发展轨迹》,《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洪涛,韩志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2期;洪涛:《〈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于亦璇,苗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殖民地朝鲜的传播与实践》,《古代文明》,2023年第1期;等等。

学界受当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亦未能展开深入的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开辟》为切入点,把握其论调嬗变的脉络,探明嬗变的内在逻辑与多重原因,借以管窥该时期朝鲜半岛思想界的动向以及社会主义在朝鲜半岛本土化的初期历史。

一、三一运动与《开辟》的创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受列宁《和平法令》与威尔逊《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民族自决"思想的鼓舞,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反殖民运动。1919年2月以来,约200万民众在朝鲜半岛各地陆续举行集会1540余次,向日本殖民当局与国际社会表明渴望独立的强烈意志。这场运动在3月1日因高宗李熙的葬礼而达到高潮。数十万民众汇聚京城向大韩帝国的开国皇帝表达哀思,33名民族代表言辞宣明:"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②]尽管此次运动在日帝的武装镇压下失败,但日本殖民当局为应对该运动后不断恶化的国际舆论,不得已调整了此前依靠暴力的"武断统治"方针,转而推行所谓"促进文化昌盛与民力充实"的"文化政治"[③],有条件地赋予民众结社、言论、出版等活动的自由。受该政策的推动,朝鲜半岛内部迅速掀起结社的热潮,各种青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新式报纸、杂志也应运而生,成为宣扬启蒙思想的阵地。

作为主导三一运动的核心力量之一,天道教也在该时期成立"天道教青年会",并创办《开辟》杂志。天道教最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出身于没落儒士家庭的崔济愚(1824—1864)为应对西学东渐以及朝鲜王朝秩序紊乱、民生凋敝的困局,于1860年创立民间宗教"东学"。该宗教受基督教信仰上帝的启发,强调"侍天主",但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侍奉天主"。根据崔济愚的诠释:"'侍'者,内有神灵,外有气化,一世之人,各知不移也。"[④]其所谓的"内有神灵",指的是"天主"显现于人的心中,而"外有气化",则是"天主"在人心作用下对外部发挥力量,故实则讲求人与"天主"的合而为一,即人人皆可成"天主"。此种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不仅在朝鲜半岛南部乡村地区吸引了众多信徒,而且从观念层面间接促成了东学农民起义的爆发。

至20世纪初期,"东学"在第三代教主孙秉熙(1861—1922)的领导下改名"天道教",并开始致

①韩国学界在阐明本土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础上,围绕各大社会主义组织的思想展开了初步的研究。运动史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且不限于:임경석:《初期社會主義運動》,天安:獨立紀念館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所,2009年版;전명혁:《1920年代韓國社會主義運動研究》,서울:鮮仁,2006年版;이현주:《韓國社會主義의 勢力의 形成》,서울:一潮閣,2003年版。思想史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且不限于:임경석:《韓國社會主義의 起源》,서울:歷史批評社,2003年版;朴哲河:《1920年代社會主義思想團體研究》,崇實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박종린:《日帝下 社會主義思想의 受容에 關한 研究》,延世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学者聚焦20世纪20年代包括《开辟》在内的各种杂志,探讨了其中关涉社会主义的内容,例如:尹謹植:《〈開闢〉誌에 나타난 韓國政治思想에 관한 研究》,《省谷論叢》(第3辑),1972年;한기형:《殖民地檢閱政策과 社會主義關聯雜誌의 政治的力學——〈開闢〉과 〈朝鮮之光〉의 歷史的位相分析과 관련하여》,《韓國文學研究》(第30辑),2006年;박종린:《1920年代初社會主義思想의 受容과 〈新生活〉》,《史林》(第49辑),2014年;박민철:《1920年代後 半殖民地朝鮮의 맑스주의 受容 樣相과 意味——〈朝鮮之光〉"唯物·唯心論爭"을 中心으로》,《韓國學研究》(第59辑),2016年;許洙:《〈開闢〉論調의 社會主義化에 관한 새로운 接近——topic network 分析을 中心으로》,《人文論叢》(第78辑),2020年;其中,许洙运用"专题网络"软件,发现1923年7月以后《开辟》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频率大幅度上升,为本文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②朝鮮民族代表:《宣言書》,韩国独立纪念馆藏,典藏号:1-001152-000。

③松村明,佐和隆光,养老孟司主编:《日语新辞林》(日文影印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5页。

④金勋:《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力于民族的觉醒与独立。孙秉熙曾因东学农民起义失败而流亡日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受日本文明开化思想的影响，自1905年重返朝鲜半岛后，一方面通过改宗教名为“天道教”，颁布《天道教大宪》，明确教旨为“人乃天”①，在汉城设立教会总部等举措，进一步完善了教会的体系；另一方面，尤为注重发展出版与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万岁报》《天道教会月报》，收购同德女子义塾与普成专门学校②。也因此，天道教深受朝鲜爱国青年的欢迎与拥护，教会力量迅速壮大，至三一运动期间，33名民族代表中天道教人有15名之多。三一运动后，迫于大部分天道教领导人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青年一代迅速成长为天道教的中坚力量。以李敦化、朴达成、李斗星等为代表的青年信徒，于1919年9月成立“天道教青年教理讲演部”，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在朝鲜半岛各地成立支部8处，吸纳青年信徒600余名③。同时，他们紧跟当时发行报刊的热潮，于同年12月20日向殖民当局提交了《开辟》的发行许可申请④。然而，限于殖民当局严格的审查制度，该申请直至1920年5月22日才得到批复⑤。此时的天道教青年教理讲演部已于同年4月25日改名为“天道教青年会”⑥。青年会随即于6月8日成立出版社，名为“开辟社”，并在6月25日正式发行《开辟》的创刊号⑦。而之所以把杂志命名为“开辟”，“创刊辞”开宗明义：

> 神始于渺小，从肇判有无，到编织太阳系，再至创造万物，此乃宇宙的“开辟”；人自神进化而来，代表万物，从捕鱼狩猎，到从事农业，再至开启商业，进化又进化，直至当今始而充盈着所谓“世界大改造”的革新气息，此乃《开辟》的“开辟”。⑧

可见，《开辟》顺应世界“改造”的浪潮而生，意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也因此，《开辟》虽然由天道教青年会创办，但很少刊登与天道教相关的内容⑨，而是以论述文、杂文、小说等为主，在刊登杂志社主笔文章的同时，广泛接受读者来稿，构建起具有开放性的公共媒体空间。其中，论述文的比例占据了过半的版面⑩，主要聚焦于朝鲜半岛内外的现实问题、时事动态、思想观念等。其自创刊以来深受朝鲜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许多青年外出时，都习惯在肘间夹着一本《开辟》⑪；假如拿着一本《开辟》去参加友人聚会，亦会迅速成为聚会的焦点⑫。不过，《开辟》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20年代朝鲜半岛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不仅仅源自其极具启蒙意义的社论或评论，还得益于先进的销售模式。起初《开辟》依托天道教青年会的各地支会，设立“分卖所”进行贩卖，从最初的9所，至次年增长到56所。自1921年8月，开辟社为进一步完善销售体系，在本社与分卖所之间设置了“支社”，至1922年末，共成立支社11处，直至1926年8月被迫停刊共成立支社52处，这令《开辟》的

---

①“道则天道，学则东学，则古之‘东学’，今之‘天道教’。宗旨‘人乃天’，纲领‘诚信双全，教政一致’，目的‘保国安民，布德天下，广济苍生，地上天国’，伦理‘侍人如天，修行道德，诚敬信’。”趙基周 编著：《東學의 原流》，서울：天道教中央總部出版部，1982年版，第230页。

②同德女子义塾现为同德女子大学，位于韩国首尔市城北区。普成专门学校现为高丽大学，位于韩国首尔市城北区。

③隱名生：《快히 教理講演部에 응하라》，《天道教會月報》第112號，1919年12月。

④作者未详：《開闢史略史》，《別乾坤》第30號，1930年7月。

⑤作者未详：《開闢雜誌 許可》，《東亞日報》，1920年6月2日第3版。

⑥李敦化：《朝鮮新文化建設에 對한 圖案》，《開闢》第4號，1920年9月25日。

⑦《开辟》第1号至第4号于每月25日发行，从第5号开始改为每月1日发行。作者未详：《編輯社告》，《開闢》第4號，1920年9月25日。

⑧作者未详：《創刊辭》，《開闢》創刊號，1920年6月25日。

⑨据统计，《开辟》中涉及天道教的文章仅占2%。김정인：《〈開闢〉을 낳은 現實，〈開闢〉에 담긴 希望》，《歷史와 現實》第57辑，2005年，第25页。

⑩据统计，72期《开辟》杂志中，共刊登论述文332篇。

⑪박영희：《新興文學의 抬頭와 開闢時代의 回顧》，《朝光》第32號，1938年6月。

⑫최덕교 編著：《韓國雜誌 百年》（第2卷），서울：현암사，2004年版，第11页。

销售体系更加稳固[①],甚至可以媲美当时的主流报刊。作为殖民地时期三大报刊之一的《东亚日报》,在1922年2月之时,也仅成立支局48所、分局140所[②]。

尽管如此,《开辟》的发行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日帝严苛的审查制度下屡遭重创。当时日本殖民当局虽推行"文化政治",表面上赋予了朝鲜人创办杂志的权力,但仍沿用1909年颁布的《出版法》,要求所有杂志在出版前必须经过警务局高等警察科的审查,即便通过审查也有可能在刊印后被禁止销售或收缴。《开辟》创刊号就因封面中出现猛虎的画像,诗歌中关涉哀叹朝鲜亡国的内容,被殖民当局限制发行。无奈之下,开辟社遵照要求删除了相关内容,于6月27日刊印"号外",但还是被禁止销售。最终于6月30日再次发行"临时号",才得以创刊[③]。此后,《开辟》在存续期间,共被禁止销售或收缴37次,停刊1次,处以罚金1次,其频繁程度让编辑不禁感慨:"每三个月都会经历一次,已不再震惊。"[④]

二、"改造"的空想与破灭

1920年6月《开辟》创刊之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和远东国际民族会议尚未召开的过渡阶段,似乎整个世界秩序都将迎来一场剧变。无论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还是威尔逊的"民主和平"论,都在反思一战,探寻构建新世界的方略。此种"改造"[⑤]世界体制的风潮,无疑让身处殖民地的朝鲜知识分子燃起"改造世界"的希望之火[⑥]。《开辟》的创刊号中也宣称:"当今的世界处于改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向上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把它称作'黎明''曙光',抑或'开辟'……每日每日'改造''改造'的声音都在敲击着我们的耳膜。这个声音既有趣又有益,既有力量又有灵魂。该声音所到之处,也是当今我们的幸福之所在"[⑦]。

《开辟》期待着世界秩序"改造"的风潮能够吹入朝鲜半岛,"改造"被日帝殖民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改造''改造',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拆解并重组名为'世界'的机器。只有修好过去充满各种矛盾,各种不合理、不公平、不彻底的机器,才能让它恢复顺畅的运转"。而究竟什么是"不合理、不公平、不彻底"的部分?他们将其阐释为:"优者肆意妄为,劣者无从辩解;富者享受优待,贫者毫无保障;智者与强者霸占舞台,愚者与弱者丧失乐园。"表面上,他们痛斥世界上基于优劣、富贫、强弱的标准而形成的境遇差异,实则隐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对世界和平、合理、公平秩序的破坏。故而,他们期待"改造"后的世界:"弱者虽身处强者的旁边,但两者的权力能够调和;贫者虽身处富者的旁边,但两者的利益能够均衡;劣者虽身处优者的旁边,但两者的价值能够相宜。"[⑧]易言之,《开辟》所憧憬的是,不再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力量的强弱,而是建立在某种道义体系之上的世界秩序。为了构建上述新的世界秩序,《开辟》进一步明确了"改造"的目标:"抽象而言,是发现正义与

①최수일:《〈開闢〉研究》,서울:소명출판,2008年版,第285-291页。

②東亞日報社社史編纂委員會:《東亞日報社史》(第1卷),서울:東亞日報社,1975年版,第117页、第173页。

③백순재:《日帝의 言論政策과 筆禍事件》,《新東亞》第33號,1967年7月。

④作者未详:《本 臨時號를 읽을 이에게》,《開闢》第25號,1922年7月10日。

⑤"改造"一词源自罗素于1915年在伦敦的演讲与1916年出版的著作《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是"Reconstruction"的朝鲜语译文。罗素在该演讲与著作中,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社会原因,并摸索可以避免战争的各种改造社会的方向。此后,包括罗素在内,许多知识分子倡导"改造"论,不仅仅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而且包含着对新世界、社会体制的期待。无政府主义者改造社会的思想由备受冷落到风靡一时,即昭显着这一潮流发生的普遍性。

⑥金亨國:《1920年代 初 民族改造論 檢討》,《韓國近現代史研究》(第19輯),2001年,第188-191页。

⑦作者未详:《世界를 알라》,《開闢》創刊號,1920年6月25日。

⑧作者未详:《世界를 알라》,《開闢》創刊號,1920年6月25日。

人道，实现平等与自由；具体而言，是强弱共存主义与病健相保主义。”[①]即通过发掘并利用“正义”与“人道”的道德约束力，实现各国家、民族乃至个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把今后的人类社会改造得合理、完全、彻底地符合每个人的需要”[②]。此种对道义的强调，既是《开辟》对“改造”世界关键性机制的理解，也是身处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在探索解放方略的初级阶段，对重建世界秩序的美好设想。

《开辟》创刊初期对“改造”的推崇与倡议，同样适用于朝鲜半岛。他们批判朝鲜半岛过去“不合理、不公平、不彻底”的一切，并指出“压迫”是其中最深重的问题[③]。在家庭层面，从父慈子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家庭秩序[④]，到“早婚的恶习”“祭祀的虚礼”“巫堂的迷信”[⑤]，都成为他们讨伐的对象。他们痛斥朝鲜王朝以来理学中的尊卑观念，认为其不仅侵犯了个体的人格，而且限制了活动的自由。在社会层面，《开辟》发现朝鲜与西方一样存在着“劳动问题”，即“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寻求经济平等的运动”。但与西方城市中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同，朝鲜半岛最需关注的“劳资调和”是农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⑥]。他们指出，朝鲜半岛的工业尚未发达，工业劳动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能力上都缺乏组织运动、搅动舆论的实力[⑦]；反之，朝鲜半岛仍以农业为本[⑧]，但农村无论是基础建设、经济收入，还是教育条件等，都“是世界上唯一的地狱”[⑨]。《开辟》洞察到当时朝鲜农村的绝大部分农民均为佃农，且他们“不仅在社会上受到奴隶般的待遇，而且在经济上过着野兽般的生活”[⑩]。事实上，该时期朝鲜半岛的农村因20世纪初期朝鲜总督府强制施行的“土地调查事业”而自耕农人数骤减，佃农人数增加，日益呈现地主与佃农两极分化的趋势[⑪]。从自耕农沦为佃农的朝鲜农民，不得不租种日人地主或朝鲜人地主的土地，承受苛敛诛求，以及随意解除契约的痛苦[⑫]。

《开辟》在痛斥“压迫”问题的同时，再次指出只有“人道”“正义”能够终结“压迫”[⑬]。然而，究竟何为“人道”“正义”？他们阐释道：“它以发扬最高人格——真、善、美为目标，并将其运用到人类世

①作者未详：《世界를 알라》，《開闢》創刊號，1920年6月25日。

②朴達成：《社會問題에 先하야 自我問題에 反하라—— 그리하야 社會에 對한 公僕이 되라》，《開闢》第12號，1921年6月1日。

③作者未详：《人道正義 發展史로 觀한 今日以後의 모든 問題》，《開闢》第4號，1920年9月25日。

④吳台煥：《急變하야 가는 新舊思想의 衝突》，《開闢》創刊號，1920年6月25日；沧海居士（李敦化）：《가족제도의 측면관》，《開闢》第3號，1920年8月25日；白頭山人（李敦化）：《東洋式의 倫理思想 變遷概觀（續）——家庭倫理의 一端》，《開闢》第17號，1921年11月1日。

⑤作者未详：《世界 三大 問題의 波及과 朝鮮人의 覺悟如何》，《開闢》第2號，1920年7月25日；姜仁澤：《나의 본 朝鮮習俗의 二三》，《開闢》第5號，1920年11月1日。

⑥作者未详：《世界 三大 問題의 波及과 朝鮮人의 覺悟如何》，《開闢》第2號，1920年7月25日。

⑦作者未详：《世界 三大 問題의 波及과 朝鮮人의 覺悟如何》，《開闢》第2號，1920年7月25日。

⑧白頭山人（李敦化）：《社會現象概觀——나의 생각은 이러합니다》，《開闢》第10號，1921年4月1日。

⑨崔重甲：《今日 朝鮮의 勞資關係——地主와 小作人》，《開闢》第15號，1921年9月1日。

⑩崔重甲：《今日 朝鮮의 勞資關係——地主와 小作人》，《開闢》第15號，1921年9月1日。

⑪所谓的“土地调查事业”，是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鲜半岛至1918年间朝鲜总督府以掌握半岛土地资源情况为名义推动的一项大规模调查工作。主要调查内容为土地所有权、土地价格与地形地貌。该调查过程中，殖民当局把大量未明确所有权的土地收归国有，再以低价售卖给日人资本家、地主与亲日朝鲜人，直接导致此前虽占有土地但为避税而未登记的朝鲜自耕农失去土地，只得远赴城市寻求生计或沦为佃农。愼鏞廈：《日帝下의〈朝鮮土地調查事業〉에 대한 一考察》，《韓國史研究》（第15輯），1977年，第80-85、158-160页。

⑫이송순：《1920—30年代 前半期 植民地 朝鮮의 農家經濟 分析》，《史學研究》（第119輯），2015年，第304-307页。

⑬作者未详：《人道正義 發展史로 觀한 今日以後의 모든 問題》，《開闢》第4號，1920年9月25日；朴達成：《社會問題에 先하야 自我問題에 反하라——그리하야 社會에 對한 公僕이 되라》，《開闢》第12號，1921年6月1日。

界的所有活动之中。”[①]此番对个体与其精神力量的强调,似乎沿袭了东亚思想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德主义,即以个体道德的完善催化社会制度的变革。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当时朝鲜半岛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与天道教的“人乃天”信仰,或许更为直接地作用于“改造”初期对个人及其精神力量的推崇。

政治处境方面,他们在日帝严苛的政治、言论监管政策下,在无法通过社会运动尝试“改造”的环境中,只得寄希望于“个人”的彻底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自律领域的扩大,从而削弱殖民当局的权力,让自主与自治得以实现。《开辟》创刊人之一朴达成曾在1921年6月抛出“改造”朝鲜社会的关键性问题:“谁是‘改造’的主人公?是哪个国家还是民族?是哪个团体还是党派?”他自问自答道:“每个人类个体都是改造的主人公。”因为“社会”本是由个人组成的集团汇合而成,能破坏社会、又能改造社会的,只有人类自己。鉴于“个人”在“改造”中的主体性作用,朴氏同时主张,最需“改造”的客体亦是“个人”。他倡导,“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价值、责任、目标,先付出诚实的努力成为自己,再成为人类社会忠实的公仆”[②]。与此同时,《开辟》的主笔们也纷纷表达对“个人”的期望。李敦化期待“新人物”的出现,拯救朝鲜半岛于水火[③]。金起田则主张,朝鲜需要两种“完人”,分别是“感性的大伟人”与“理性的大伟人”。前者在朝鲜社会中“放火”,烧尽陈腐的一切,后者决定继续燃烧什么,并埋下新的“种子”[④]。然而,上述对“个人”的要求或期许,尽管关注到了“从自我延伸至社会”的逻辑,但无疑缺失了“自我形成并受制于社会”的唯物论。不但如此,他们把“社会”视作建立在普遍伦理基础之上的自主空间,忽略了国家权力在“社会”中的主导性作用。

天道教教义方面,天道教青年会创始人兼《开辟》主笔之一的李敦化在承袭“人乃天”教义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人性”对“改造”的力量。自《开辟》创刊以来,李氏即强调“改造是人的灵力作用于自然的结果”[⑤]。至1921年4月,他进一步围绕“人的灵力”展开诠释,提出“解放人性”与“人性自然主义”,一方面指出“人性在本质上具有‘无穷性’”,倡导“人们摆脱束缚自己的陈腐外壳,让人性发挥出本来的无穷光彩”[⑥];另一方面,主张每个人都应如“鸢飞于天,鱼跃于渊”,在社会上发挥自己自然具备的个性,并享受人格上的平等[⑦]。总而言之,作为天道教的主要理论家,李氏把“人乃天”教义中“人”的无穷可能性,进一步延伸为“人性”的无穷性与平等性,并据此立论,试图化解当时社会中富贫、强弱、优劣群体之间尖锐的矛盾。

然而,《开辟》创刊初期对“正义”“人道”以及个人精神力量的无限希冀,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迅即走向分崩离析。朝鲜知识分子自1921年7月获知美国向英、法、日等国提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时,就一直盼望着该会议能够基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削弱乃至剥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特权,但直至1922年2月会议结束,该问题甚至未曾被提及。由此酿出的失望情绪[⑧],令他们迅速看清西方宣称“改造”世界秩序的虚伪面目,转而再次自主探寻拯救朝鲜的方法。为此,他们罔顾“个人”尚未觉醒已陨丧于圣战之途,匆忙地把“改造”的对象置换为“民

①作者未详:《人道正義 發展史로 觀한 今日以後의 모든 問題》,《開闢》第4號,1920年9月25日。

②朴達成:《社會問題에 先하야 自我問題에 反하라——그리하야 社會에 對한 公僕이 되라》,《開闢》第12號,1921年6月1日。

③李敦化:《新時代와 新人物》,《開闢》第3號,1920年8月25日。

④妙香山人(金起田):《想之餘感之極》,《開闢》第8號,1921年2月1日。

⑤李敦化:《新時代와 新人物》,《開闢》第3號,1920年8月25日。

⑥李敦化:《사람 性의 解放과 사람 性의 自然主義》,《開闢》第10號,1921年4月1日。

⑦李敦化:《사람 性의 解放과 사람 性의 自然主義》,《開闢》第10號,1921年4月1日。

⑧朝鮮總督府 警務局:《大正11年朝鮮治安狀況》,서울:高麗書林,1989年版,第153页。

族”，让“民族”重新登上世界互争雄长的舞台。

华盛顿会议闭幕的第三日，《开辟》开篇便刊登了题为《民族兴衰的分界点》一文[①]。该文作者一面反思此前“改造”的宣传是否深入普通民众的内心，一面隐晦地指出，朝鲜民族兴衰的关键在于两千万民众的意志，以图重新把知识分子的关注点转向“民族”。至1922年5月，《开辟》刊登了有关“民族改造”的系列文章。其中，李敦化摒弃此前倡导的“解放人性”与“人性自然主义”，转而强调“生命无穷主义”与“改造民族”。所谓的“生命无穷主义”指的是：由于生命可通过传承而具有无穷性，故“民族”在此基础上亦拥有绵延不断的“大生命”。基于此，他提倡个人的精神与活动都要以是否有益于“民族的大生命”为标准，“改造”过去对安逸、名誉、权势等一己私利的追求[②]。同时期，著名小说家李光洙也整合自己此前对个人、个性改造的主张，发表题为《民族改造论》的长篇文章，强调“民族改造”是拯救朝鲜民族的唯一方法，并明确指出“民族改造的关键在于民族性的改造”。他痛斥朝鲜民族堕落的民族性——虚伪、自私、怠惰等，认为它们是导致民族衰弱的症结。为了改造此类堕落的民族性，亟需以“盎格鲁撒克逊族”“拉丁族”等民族为模范，改造出“真正的、讲信义、有勇气、具有社会凝聚力、均等富有的”朝鲜民族[③]。

上述有关“民族改造”的论调，尤其是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一经发表即遭到了广泛的批判。崛起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其为标靶，强烈表达出对此前一切精神“改造”论的不满。申相雨率先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怒斥李光洙对朝鲜民族性的论断不过是其个人的愚见，内含自我毁灭式的历史意识，并重申“五千余年悠久的朝鲜民族的历史，是不朽的历史”[④]。辛日镕则从三个层面批判了《民族改造论》：一是李光洙视西方民族为典范的言论，充分暴露了他的无知与浅陋，可谓“钦慕帝国主义，却愚蠢而虚荣的病人”；二是当今朝鲜民族挣扎于饥饿与衰亡边缘的原因，并非源于民族在生理或精神上的缺陷，而是“征服与压迫的事实”；三是一切不关涉经济组织、社会制度改革的“改造”方案，都是“麻痹民众精神的麻醉剂，或是为了维持现状，拥护强者的、虚伪的现象维持论”[⑤]。

正如辛日镕所言，《开辟》创刊以来从“个人”到“民族”的“改造”论，看似发生了从个人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实则因救亡时局的恶化而重新回归“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次陷入仅有优者、强者才能享受自由、平等的殖民主义悖论。不但如此，其“改造”的倡议，无论是迫于身陷殖民地的窘境还是出于天道教的教义，都过于执着于从精神层面立论，未能体察帝国与殖民地之间，以及朝鲜社会内部产生矛盾的物质性原因。何况精神层面的“改造”要求，本就缺乏贯彻与检验的实际路径，几乎不具有实践意义。如此极具理想色彩的“改造”论，更像是被囚禁已久的心灵，在看到自由曙光时释放的“焦灼私语”[⑥]，尽管其中包含着一些尝试性的理性设计，但在四面楚歌的现实形势中，很快暴露出理性本身的多重局限，呈现崩裂瓦解的态势。

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与探索

在“改造”论甚嚣尘上的时期，朝鲜半岛内部社会主义思想亦在悄然萌芽。《开辟》的创刊号中

①作者未详：《民族興替의 分岐點》，《開闢》第20號，1922年2月8日。

②李敦化：《空論의 人으로 超越하야 理想의 人、主義의 人이 되라》，《開闢》第23號，1922年5月1日。

③李春園：《民族改造論》，《開闢》第23號，1922年5月1日。

④申相雨：《春園의 民族改造論을 讀하고 一端을 論함》，《新生活》第6號，1922年6月1日。

⑤辛日鎔：《春園의 民族改造論을 評함》，《新生活》第7號，1922年7月1日。

⑥参见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

已然出现“社会主义”一词[①],第2号又刊登了笔名“孤蝶”的《社会主义的略义》,文章简要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指出其内部可细分为“共产主义”“公有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②]。也因此,《开辟》可被视作最早把社会主义理论引入朝鲜半岛的杂志。尽管如此,主笔之一的金起田还是在1921年3月发出感叹:“当前朝鲜研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仍是少之又少。”[③]该时期的“社会主义”,多被视作众多“主义”之一,与“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④]“超国家主义”“世界一家主义”[⑤]“国粹主义”“联邦主义”[⑥]等并驾齐驱。其中,甚至不乏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如玄禧运曾指出“社会主义者认为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全部”[⑦];李敦化把托尔斯泰视作“社会主义”的代表学者,并认为“社会主义”等同于利他主义[⑧];郑圭璇也曾批判“共产主义”所倡导的财富共同分配,会让人类变成机器,丧失一切人生的乐趣[⑨]。

纵使《开辟》前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常常有失偏颇,但并不影响社会主义力量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壮大。三一运动后,曾在日本活动的部分朝鲜社会主义运动家回到朝鲜半岛,秘密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并通过创办内部刊物、印发小册子等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与唤醒无产阶级。至1921年,朝鲜半岛内部已呈现“首都共产团体”“朝鲜共产党”“社会革命党”与“马克思主义小组”四大社会主义团体鼎立的局势[⑩]。他们一方面组织城市劳动者举行罢工,乡村佃农开展减租运动[⑪];另一方面与保守的、具有一定资产的知识分子逐渐划清界限,谴责他们对日本殖民当局妥协的行径。

随着社会主义的风潮逐渐席卷朝鲜半岛,《开辟》中也零星地出现了从物质、阶级等视角反思此前“改造”论的声音。1923年伊始,根据《开辟》“一记者”的报道,此前一年朝鲜半岛社会主义青年会、生活会等组织层出不穷,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日益猛烈[⑫]。相较于“改造”,更为激进的“解放”似乎成为呼之欲出的口号。有论者开始探讨如何从“煽动性的解放”转向“实际的解放”,并指出真正的“解放”具有双重内涵,一个是内在的、内心的解放,还有一个是外在的解放。他援引马克思的唯物论,强调假如没有外在的解放,就不会有内在的解放,进而反思“今日我们总想改造我们的心理,但心理到底无法被单独改造,只有改造影响心理的重要的外部社会制度才可以”[⑬]。李晟焕则直接抨击此前的“改造”论是“舍本取末”,因为无论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还是对主义的追求,都不及当前最为迫切的“农民解放运动”[⑭]。金松隐同样指出,当前朝鲜农民的生活徘徊在饥馑的边缘,不仅受到外国资本,还受到资本主义化的士绅的压榨,故而,“我们之所以讨论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的

①白頭山人(李敦化):《羅巴 滅亡說》,《開闢》第2號,1920年7月25日;孤蝶:《個人主義의 略義》,《開闢》第2號,1920年7月25日。

②孤蝶:《社會主義의 略義》,《開闢》第3號,1920年8月25日。

③金起濛:《아니여쭐수업사와》,《開闢》第9號,1921年3月1日。

④朴達成:《東西文化史上에 現하는 古今의 思想을 一瞥하고》,《開闢》第9號,1921年3月1日。

⑤朴達成:《社會問題에 先하야 自我問題에 反하라——그리하야 社會에 對한 公僕이 되라》,《開闢》第12號,1921年6月1日。

⑥作者未详:《民衆이어 自重하라》,《開闢》第23號,1922年5月1日。

⑦玄哲(玄禧运):《文化事業의 急先務로 民衆劇을 提唱하노라》,《開闢》第10號,1921年4月1日。

⑧白頭山人(李敦化):《現代倫理思想의 概觀——東洋式 倫理思想의 變遷》,《開闢》第16號,1921年10月1日。

⑨海參 鄭圭璇:《改造問題에 關與하는 社會連帶의 精神》,《開闢》第27號,1922年9月1日。

⑩金俊燁,金昌順:《韓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第2卷),서울:清溪研究所,1986年版,第33-37页。

⑪一記者:《壬戌 一年事의 總觀》,《開闢》第31號,1923年1月1日。

⑫一記者:《壬戌 一年事의 總觀》,《開闢》第31號,1923年1月1日。

⑬作者未详:《煽動的 解放으로브터 實行的 解放에——解放號 첫머리에 쓰는 것이라》,《開闢》第32號,1923年2月1日。

⑭李晟煥:《먼저 農民부터 解放하자》,《開闢》第32號,1923年2月1日。

生活要求我们讨论社会主义”[①]。金起田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朝鲜社会运动中最为兴盛的农民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从根本上对社会的改造[②]。

然而，真正让《开辟》论调以及朝鲜半岛思想界转向社会主义的关键性事件，则是1923年上半年由民族资本家掀起的物产奖励运动。华盛顿会议闭幕后，以东亚日报社为代表的朝鲜民族资本家们悲观地意识到，日本已然成为能够与英国、美国比肩的强国，朝鲜在短时间内实现独立的希望十分渺茫[③]。此种共识让本就缺乏斗争精神的民族资本家们愈发丧失了抵抗的意志，转而倡导“养成实力”，静待独立的机会。1923年1月，他们在京城结成“朝鲜物产奖励会”[④]，试图通过号召“朝鲜人购买并使用朝鲜人制作的东西”[⑤]，抵挡日资对朝鲜市场的蚕食，振兴民族企业，进而实现经济上的自立。

该口号一度在民众之间掀起购买本土制品的热潮，但旋即遭到了大部分社会主义组织的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党首都派的先锋组织“高丽共产党”在1923年3月召开全朝鲜青年党大会时[⑥]，秘密通过“阻止物产奖励运动”的决议。根据决议内容，可知他们对物产奖励运动的判断：

> 它是资产阶级为维持经济现状而开展的利己运动；
>
> 它是试图抹杀阶级意识的阴谋；
>
> 在“物产奖励”口号的影响下，国货价格上涨，让无产者在现实生活中陷入无力购买的窘境。[⑦]

可见，高丽共产党反对的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利己的运动。此种反对，并不代表他们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合作，因为根据高丽共产党的纲领，“依靠革命斗争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独立”是最终目标，他们在“民族革命阶段”愿意与资产阶级势力一起进行革命斗争，而非妥协性的运动[⑧]。同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家李星泰、朱钟健、张赤波、朴衡秉等人，也陆续在《东亚日报》《朝鮮日报》刊发文章，从相似的视角对物产奖励运动表达激烈的抗议[⑨]。

恰如上述左翼知识分子所判断，物产奖励运动很快便失去了民心。面对民众陡然增长的本土产品需求，民族企业未能迅速解决生产设施匮乏、产量低下的生产力问题。这也直接导致本土产品价格不断攀升，令民众丧失了购买的热情。随着物产奖励运动陷入低迷，一部分主导该运动的民族资本家转而又向日本殖民当局寻求资金补助[⑩]，也让民众看清，他们最关心的并非所谓的“民族经济自立”，而是自身的利益。

物产奖励运动犹如导火索，不仅直接激化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而且反向助长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令其一跃成为朝鲜半岛反帝反殖民斗争的中坚力量。此前，《开辟》中也曾时常出现“阶级”一词，但多从身份相似性或利益相关性的角度界定“阶级”，创造出“学者阶级”[⑪]

---

①金松隱：《新生活의 發行禁止와 吾人의 管見》，《開闢》第32號，1923年2月1日。

②起瀓（金起田）：《農民運動國産運動이 勃發하기까지》，《開闢》第32號，1923年2月1日。

③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太平洋會議二對スル金東成ノ所感》，《朝鮮治安狀況（一九二二）》，韩国独立纪念馆藏，典藏号：006466-007-0397。

④李順鐸：《〈社會主義者가 본 物産奬勵運動〉——李星泰氏의 論文을 評함》，《東亞日報》，1923年3月30日第4版。

⑤朝鮮物産奬勵會：《朝鮮物産奬勵會 趣旨書》，《産業界》第1號，1923年12月。

⑥李賢周：《全朝鮮青年黨大會 研究》，《韓國近現代史研究》第9輯，1998年，第185-186页。

⑦李江（梁明）：《朝鮮青年運動의 史的 考察（中）》，《現代評論》第9號，1927年10月。

⑧金思國：《報告1：朝鮮에서 共産主義組織의 出現 및 活動의 史的 概觀》，1924年3月17日，第2页。

⑨朱鐘建：《無産階級과 物産奬勵——羅公民君의〈物産奬勵와 社會問題〉及其他에 對하야（12回連載）》，《東亞日報》，1923年4月6日—1923年4月17日；张赤波：《羅公民君의 謎妄的 挑戰에 答함（13回連載）》，《朝鮮日報》，1923年4月24日—1923年5月5日；朴衡秉：《朝鮮物産奬勵를 代辯하라는 羅公民君에게 告함（18回連載）》，《朝鮮日報》，1923年6月1日—1923年6月19日。

⑩윤해동：《物産奬勵運動——“近代化”를 為한 不可避한 徑路인가?》，《來日을 여는 歷史》（第5輯），第150页。

⑪玄哲（玄禧运）：《文化事業의 急先務로 民衆劇을 提倡하노라》，《開闢》第10號，1921年4月1日。

“旧人阶级”[①]“上流阶级”“中流阶级”“贫民阶级”[②]等合成名词。随着资本家在物产奖励运动中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利己性与妥协性,《开辟》中本混沌的“阶级”概念也逐渐显现出内蕴的对立属性。1923年5月,《济世安民之策是此还是彼》一文的作者明确指出,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及其导致的“榨取阶级”与“被榨取阶级”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继而发生阶级斗争[③]。该观点与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厘定“阶级”的方式几乎实现模糊的重合。而6月题为《将来的新社会与传统宗教、道德的价值》的文章中,作者用更长的篇幅,阐释“有产”与“无产”阶级形成对立的根本原因,以及两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④]。

至1923年7月,物产奖励运动几近丧失生机,曾认同“养成实力”路线的许多朝鲜民众转而纷纷加入社会主义团体。《开辟》将该现象称为“朝鲜人心的激变”,而“朝鲜人心”之所以发生“激变”,是因为社会主义成为了他们“独立心的变体”,即作为一种弥补和替代,社会主义承载着独立的希望,迅即捕获了朝鲜的人心。不但如此,社会上还逐渐出现了排斥绅士风与推崇劳动风的倾向[⑤]。

无论是出于对资本家的彻底失望,抑或对朝鲜半岛运动形势的考量,《开辟》自1923年中期开始反省此前“主义”不明的问题[⑥],逐渐倾向于刊登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文章,显露出与社会主义力量相同的立场。此历程中,曾活跃于左翼杂志《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李星泰与郑志铉,可谓引领了《开辟》论调的转向。他们自1923年1月《新生活》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封禁后,曾试图再次创办类似杂志《新社会》[⑦],但并不顺利,最终成立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团体“民众社”,翻译、出版社会主义相关书籍。在此期间,他们选择向当时最畅销的杂志《开辟》投稿,试图把其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舆论阵地。自第36号以来,李星泰使用“ST”“SY”“YS生”“静观生”“动观生”等笔名[⑧],在《开辟》发表论述文共计19篇,从《甘地的运动与印度的无产阶级》《向左翼》到《践踏左翼之后》等[⑨],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性。郑志铉则使用“白绰”“木觅山人”“木觅生”“郑栢”等笔名[⑩],在《开辟》上发表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共计13篇。尤其是他系统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家堺利彦的《社会主义学说大要》[⑪],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共产社会”等核心概念的基本要义,回应了当时朝鲜半岛民众对社会主义理论愈发强烈的渴求。不仅在论述文方面,文艺评论栏目中也刊登了众多左翼作家的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基镇的《情感漫步》《克拉尔泰运动的世界化》《统治阶级教化、被统治阶级教化》等[⑫]。

---

①장응진 외:《各地 青年團體에 對한 現代名士의 要求》,《開闢》第6號,1920年12月1日。

②鮮于全:《朝鮮人 生活 問題의 研究(其二)》,《開闢》第21號,1922年3月1日。

③作者未详:《濟世安民之策이 此乎아 彼乎아》,《開闢》第35號,1923年5月1日。

④作者未详:《將來할 新社會와 因襲的 宗教 及 道德의 價值 如何》,《開闢》第36號,1923年6月1日。

⑤作者未详:《激變 又 激變하는 最近의 朝鮮人心》,《開闢》第37號,1923年7月1日。

⑥作者未详:《各種 新聞雜誌에 對한 批判》,《開闢》第37號,1923年7月1日。

⑦《月刊〈新社會〉發行》,《東亞日報》,1923年1月27日第3版。

⑧최수일:《开辟笔名索引》,《〈開闢〉研究》,서울:소명출판,2008年版,第738页。

⑨山川均著,성태譯:《깐듸의 運動과 印度의 無産階級》,《開闢》第37號,1923年7月1日;성태:《왼편을 向하여》,《開闢》第38號,1923年8月1日;李星泰:《왼편을 밟고서》,《開闢》第44號,1924年2月1日。

⑩최수일:《开辟笔名索引》,《〈開闢〉研究》,서울:소명출판,2008年版,第739页。

⑪《社會主義學說大要》,《開闢》第40號,1923年10月1日;《社會主義와 資本主義의 立地——社會主義學說大要(其二)》,《開闢》第41號,1923年11月1日;《唯物史觀과 唯心史觀——社會主義學說大要(其三)》,《開闢》第42號,1923年12月1日;《唯物史觀의〈要領記〉——社會主義學說大要(其四)》,《開闢》第43號,1924年1月1日;《歷史進化의 事實的 說明——社會主義學說講論(終結)》,《開闢》第45號,1924年3月1日。

⑫金基鎭:《Promeneade Sentinental》,《開闢》第37號,1923年7月1日;金基鎭:《글라르테運動의 世界化》,《開闢》第39號,1923年9月1日;八峰山人:《支配階級敎化 被支配階級敎化》,《開闢》第43號,1924年1月1日。

当然,《开辟》乃至朝鲜思想界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并非一蹴而就,同样曾受到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挑战。直至1923年下半年,仍有部分知识分子为物产奖励运动辩护,其主张是朝鲜半岛的无产阶级不仅遭受着本国资产阶级的压榨,更要紧的是经历着异民族的迫害。在双重压迫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具备掀起革命的能力①。也有论者指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认为其不利于艺术或宗教的发展,提倡应发扬新个人主义②。但这些声音很快湮没在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洪流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以物产奖励运动为代表的"实力养成主义"最终被普遍视作有产阶级的所有物③,反之,一般民众所遭遇的经济困境及其解决方案日趋成为思想界的焦点话题;另一方面,严峻的殖民地形势让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相较于艺术与宗教,富含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更有助于朝鲜半岛的独立④。

与此同时,曾高唱个人与民族"改造"论的主笔李敦化,也一度销声匿迹,直至1924年初,才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态度⑤。1924年3月,李敦化在《开辟》上发表《世界三大宗教的差异与天道教的"人乃天主义"》一文,不再固守个人以及精神层面的"改造",而是把"组织"视作影响"改造"效果的首要因素,指出"组织的改造与否,将决定人类走向幸福抑或灾难的道路。即便是同一人群处于同一社会,倘若组织是完善的,将会日益幸福;倘若组织是不完善的,则会生出弊端"。那么,究竟怎样的"组织"是完善的呢?在李敦化看来,"检验人类社会中组织是否完善的标准,在于所有人都能享受自由与平等"。也因此,他批判"阶级压迫","尤其是经济层面的阶级压迫",认为"无论有多少才华,只要他的灵魂坠入无产者的家庭,其能力都会陷入草芥一般的处境。阶级压迫不仅扼制了人性的自由,而且阻碍了人性平等地发展"。对当时世界的"无产者运动",他亦表明赞扬的态度,称其是针对"现代经济组织"的"一种组织改革运动"。毫无疑问的是,李敦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接受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不仅修正了此前"改造"论中几乎完全依赖个体精神的缺陷,而且出于建设"自由""平等"社会的初衷,他开始认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念与方式。

透过李敦化思想的转向也可窥见,进入1924年,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在《开辟》乃至整个朝鲜半岛思想界已成为核心论题之一。换言之,"朝鲜内地的民众整体呈现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⑥。包括《开辟》主笔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随之进一步探讨究竟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鉴于物产奖励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人本主义的推崇,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更倾向于通过"阶级斗争"而非"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1924年2月,"BSL生"在《产业发展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文中,批驳部分社会主义人士主张优先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在他看来,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社会主义基于个体需求的生产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长久、健康地发展。他反思近几年朝鲜半岛民族资本家不断创设工厂,却未能提升生产力的原因,认为在于他们陷入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盈利漩涡,大、小资本家的恶性竞争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克服该弊端,他主张优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在该社会中,由于每个人的利益与共同体的产业息息相关,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去提升共同体的生产力,进而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他号召团结"阶级"的力量,共同对抗所有"不合理"的根源,从而迎来无产大众解放的曙光⑦。与之相类似,李

①反求室主人:《物産奬勵를 비난한 "L君"에게 寄함》,《開闢》第41號,1923年11月1日。

②林蘆月:《社會主義와 藝術——新個人主義의 建設을 唱함》,《開闢》第37號,1923年7月1日;李喆:《無宗教라야 有宗教》,《開闢》第37號,1923年7月1日。

③作者未详:《漸漸漸 異常해가는 朝鮮의 文化運動》,《開闢》第44號,1924年2月1日。

④李宗基:《社會主義와 藝術을 말하신 林蘆月氏에게 뭇고저》,《開闢》第38號,1923年8月1日。

⑤针对李敦化未及时发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主观上,他对"社会主义"持有观望的态度;二是,在客观上,该时期他专注于《人乃天要义》书籍的写作,直至1923年3月出版后才有空余的时间重新在《开辟》发表文章。許洙:《李敦化 研究》,서울:歷史批評社,2011年版,第164-168页。

⑥哈爾賓에서 李빈손:《歐俄留學에 對하야》,《開闢》第43號,1924年1月1日;십목생:《皆自新乎——最近一年中의 社會相》,《開闢》第43號,1924年1月1日。

⑦BSL生:《산업의 발전과 무산계급의 해방》,《開闢》第44號,1924年2月1日。

星泰也在同一期《开辟》中反驳“阶级斗争”尚早的论调。他强调，尽管目前朝鲜半岛的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看似未能达到“阶级斗争”的阶段，但内部“榨取阶级”与“被榨取阶级”的对立程度并不亚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究其原因，朝鲜的无产阶级主要被日本的资产阶级所剥削，其受剥削程度取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与否，而为了解决自身吃、穿的问题，已到了不得不革命的地步[①]。

为推动“阶级斗争”的展开，《开辟》开始不断向民众呼唤“阶级意识”的觉醒。对其而言，“阶级意识”不仅是当前朝鲜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关键的武器[②]，更是“防止人类成为奴隶，保持进步的意识”[③]。正如裴成龙对“阶级意识”的定义：

> 所谓的“阶级意识”，是能够区分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意识。倘若自己所属的阶级，因其他阶级的威胁、迫害而在生活上感到不安，那么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团结在一起，避免、抗拒其他阶级的威胁、迫害，这样的意识就是“阶级意识”，也是能够形成社会组织力、权力的唯一前提条件。[④]

据此观之，当时朝鲜的左翼知识分子已发现“阶级意识”具有“区分”与“联合”的双重机能。“阶级意识”能够把朝鲜人从既有的家庭、学校、地区等社会关系网中剥离出来，重新编入互不相识却利益相关的集体之中。此种意识的关键性意义在于，让本沉溺于日常生活的个人，瞬间拥有社会性力量，进而与压迫阶级、殖民当局形成对抗。是故，只有唤醒“阶级意识”，才能克服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乃至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

然而，《开辟》对“阶级意识”的唤醒却并不顺利。自1924年起，基于此前对朝鲜社会最主要矛盾，即地主与佃农之间矛盾的认识[⑤]，《开辟》中大抵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应是佃农的共识[⑥]。为唤醒佃农的“阶级意识”，他们不惜调动此前农民运动的历史资源，追溯“阶级意识”的源头至19世纪末的东学农民起义，指出起义过程中东学党人对贪官污吏的讨伐，是源于佃农的“阶级意识”[⑦]。但他们很快发现，相较于工人，佃农在形成“阶级意识”时具有诸多局限性：一是，由于佃农们不在同一场所内劳作，故难以形成一个集体[⑧]；二是，其与生俱来的“田舍古风”的悠然气质，也令他们无法像工人那样迅速汇聚成阶级[⑨]；三是，部分佃农依然固守朝鲜王朝时期的身份观念，因自己隶属“常民”阶层而拒绝与“贱民”阶层联合[⑩]。

鉴于佃农的“阶级意识”尚未彻底觉醒，《开辟》不得不探寻更为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方略。郑志铉对当时的“朝鲜青年总同盟”给予厚望，期待他们能够先向青年注入“无产阶级意识”，再组织、开展思想宣传运动，让“无产青年运动”深入民心，藉以唤醒农村劳动者[⑪]。李敦化也明确指出，“朝鲜青年总同盟”应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与佃农相互扶助开展社会主义运动[⑫]。李顺铎与笔名“六农”的作者则建议以城市劳动者带动农村劳动者的方式，先团结城市劳动者，再去组织农村劳动者，通

---

①李星泰：《왼편을 밟고서》，《開闢》第44號，1924年2月1日。

②動觀生(李星泰)：《A와 B의 問答》，《開闢》第57號，1925年3月1日；朴春宇：《朝鮮思想運動者들의 階級的組成을 推究하면서》，《開闢》第71號，1926年7月1日。

③李敦化：《사람性과 意識態의 關係——“機械意識”“階級意識”“超越意識”》，《開闢》第59號，1925年5月1日。

④裵成龍：《階級意識의 理論》，《開闢》第69號，1926年5月1日。

⑤乭伊(朴达成)：《地主는 엇지할고? ——특히 副業共進會를 機會로 入京하는 이에게》，《開闢》第40號，1923年10月1日；编辑人：《新朝鮮의 운명과 農民의 地位》，《開闢》第41號，1923年11月1日。

⑥李敦化：《朝鮮勞農運動과 團結方法》，《開闢》第46號，1924年4月1日；李顺铎：《勞働運動과 小作運動의 協同》，《開闢》第47號，1924年5月1日。

⑦李敦化：《甲午東學과 階級意識》，《開闢》第68號，1926年4月1日。

⑧李顺铎，《勞動運動과 小作運動의 協同》，《開闢》第47號，1924年5月1日。

⑨李敦化：《朝鮮勞農運動과 團結方法》，《開闢》第46號，1924年4月1日。

⑩小春(金起田)：《思想과 傾向》，《開闢》第39號，1923年9月1日。

⑪木覓山人(郑志铉)：《朝鮮青年總同盟에 對하야》，《開闢》第46號，1924年4月1日。

⑫李敦化：《朝鮮勞農運動과 團結方法》，《開闢》第46號，1924年4月1日。

过建立共同战线，达致生产力社会化与人格平等化的双重目标[①]。金璟载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带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城市的社会主义运动团体须确立决议或条文，使尚未具备阶级意识的佃农了解运动的方向；二是，城市的社会主义运动家在撰写宣传文章的时候，须使用简易的纯韩文，而非晦涩的术语；三是，城市的社会主义运动家应分散地前往农村，切实拯救佃农于水火之中[②]。

遗憾的是，《开辟》对社会主义运动路线的探索，受制于日本殖民当局渐趋严峻的言论管控形式，未能持续且深入地进行下去。早自1923年6月，日本本土已开始大规模逮捕日本共产党人士[③]，并判处堺利彦等29名日本共产党人士有罪[④]。《开辟》以及朝鲜思想界的社会主义转向也逐渐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警惕[⑤]，以致1924年秋，日本政府向议会提出制定“过激思想取缔法案”的议案[⑥]，蓄谋从法律的角度杜绝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最终，日本殖民当局于1925年4月在此前《保安法》《制令第7号》的基础上，再次追加颁布《治安维持法》，大幅度加重了对“以变更国体、政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组织成员与舆论人士的量刑[⑦]，让朝鲜左翼知识分子的举手投足几乎再无任何自由可言。《开辟》也不得不一改往日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甚至隐去核心词汇、用“OO主义”[⑧]指代，但仍旧未能避免在1926年8月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制停刊。

四、结 语

自1923年以来，以《开辟》为代表的朝鲜思想界逐渐由“改造”旧世界的吁求，转向对社会主义的推崇。此种转向并非均质对称的范式更迭，而是从朦胧的憧憬、模糊的方向，向社会主义聚焦凝定的演进。其思想的受众也并非一脉相承，而是经历了从“个人”到“民族”，再到“阶级”的骤变。该历程中，物产奖励运动或可被视作触发转向的关键契机，但社会主义能够在“改造”的诸多主义中脱颖而出，无不包含必然的要素。其一，殖民地的处境让朝鲜半岛的城市劳动者与农村佃农不仅仅受到本土资本家与地主的压迫，更是在日帝资本力量的操控下早已徘徊于饥寒交迫的边缘。物产奖励运动只是令日本、朝鲜资产阶级与朝鲜无产阶级之间的深层矛盾浮出水面。其二，“个人”本身内含的分散属性，以及“民族”在近代被赋予的竞争意味，也决定了它们无法再作为恰当的主体对抗殖民当局。反之，“阶级”所兼具的“联合”与“区分”的双重机能，能够令沉溺于日常生活的个人，瞬间拥有社会性力量，必然被知识分子所瞩目与运用。其三，反帝反殖民的目标，终究无法依靠知识分子空谈人性、民族性所能达致，而是亟需能够推动社会革命、介入日常生活的行动方略。相较于“发展生产力”的漫漫长路，“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路线无疑更切近身处殖民地的朝鲜无产大众。要而论之，社会主义的异军突起可谓20世纪20年代朝鲜半岛思想启蒙运动之神髓，不仅为反帝反殖民运动的持续深化提供强大动能，也成为东亚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环，为日后无产阶级的联动奠定重要精神根基。

[责任编辑：马晓雪]

①李顺铎：《勞動運動과 小作運動의 協同》，《開闢》第47號，1924年5月1日；曺奉：《勞働·小作 運動의 橫斷面》，《開闢》第65號，1926年1月1日。

②金璟载：《社會運動者가 본 社會運動》，《開闢》第57號，1925年3月1日。

③市川正一撰，田舍译：《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北京：世界知识社，1954年版，第58页。

④一記者：《二月의 世界》，《開闢》第45號，1924年3月1日。

⑤青吾（车相瓚）：《湖西雜感》，《開闢》第46號，1924年4月1日。

⑥《過激思想取締法案提出決定》，《東亞日報》，1924年9月6日第1版。

⑦作者未详：《二重三重의 惡法令》，《開闢》第58號，1925年4月1日。

⑧春宇：《所謂“智識階級의 新運動”》，《開闢》第64號，1925年12月1日。